

南开汉院学者文丛

音史寻幽

——施向东自选集

YINSHIXUNYOU

SHIXIANGDONGZIXUANJI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史寻幽:施向东自选集 / 施向东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9

(南开汉院学者文丛)

ISBN 978-7-310-03221-1

I. 音… II. 施…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932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省迁安万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22.875 印张 4 插页 316 千字

定价:4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出版前言

在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潮流中，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出版“学者文丛”，就是要提倡研究汉语规律，拓展文化传播，总结教学心得，弘扬学术精神。

汉语的研究是世界语言研究的组成部分。

汉语的研究是要探寻古今汉语的发生、发展、演变、创新、完善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外部环境和条件，探寻汉语内部的结构、元素、规则和格局，探寻它们相互之间的依存、制约、互动的状态和趋势，探寻汉语跟周边民族、周边国家的各种语言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给汉语和对方语言带来的变化动因和变化结果，探寻汉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如何不断完善其记录、表达、传播功能及其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探寻汉语作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交际媒介如何适应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振兴而“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说，对汉语本体既需要宏观的综合的研究，又需要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进行分门别类的微观的研究，还需要在相关的领域进行交叉的研究。

汉语的研究也要为汉语教学提供理论和方法的依据。特别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是基于汉语本体研究之上的应用理论研究。只有达到相当程度的国际化的语言，才会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对象。世界上这样的语言为数不多，汉语就位列其中。汉语的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定会取得新的进展。

和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同步，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在当今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种民族的语言就蕴含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的传播跟文化的传播相辅

相成，我们在讲授汉语的同时，必然还要传习中华文化，要有中华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比较和交流，进而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这些现实的因素会引发对于中华文化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语言教学是把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付诸实践，是应用学科。面对学生，如何驾驭课堂，需要有学识，有方法，有激情。作为教师的最大欢乐，就是亲眼看到通过自己的传授和讲解，学生学会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因此，教师的职业应该是一种充满欢乐的职业。每一节课都可以看到学生的进步，从而在心中产生成就感。好的教学模式会增强这种成就感。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已经走过了十五年的历程。如果从当年邢公畹先生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教授汉语开始，那么南开大学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已经将近五十五年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南开大学走出去的汉语学习者已经数以万计，他们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各个领域，其中有许多已经成为各国汉语教学的骨干。诚如古语所说：“教学相长”。在这个过程中，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也成长起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的第一线崭露头角，他们的著述已经开始在这个领域产生影响。为了推动学术的交流，为了鼓励更多的中青年学者跻身学术研究的前沿，我们推出这一套丛书，应该是不无裨益的举措吧。

在南开大学 90 周年校庆来临之际，这一套丛书也是我们敬奉的校庆献礼。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2008 年 10 月 1 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1)
1. 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研究	(1)
附录: 玄奘行年考辨	(80)
2. 鸠摩罗什译经与后秦长安音	(88)
3. 十六国时代译经中的梵汉对音	(100)
4. 北朝译经反映的北方共同汉语音系	(117)
5. 梵汉对音与古汉语的语流音变问题	(133)
6. 黄侃古韵闭口六部与俞敏古韵闭口六部之异同	(147)
7. 古籍研读札记	
——汉藏比较与古音研究的若干用例	(161)
8. 汉藏比较与训诂学	
——《诗经·大雅·生民》训诂举隅	(174)
9. 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再议	(185)
10. 《诗经》象声词的音韵分析	(194)
11. 汉藏语唇辅音与半元音 w 的交替	(207)
12. 汉藏比较中的历史层次与借词问题	(218)
13. 《说文解字》的音韵学地位	(229)
14. 联绵词的音韵学透视	(241)
15. 等韵学与音位学	(264)
16. 汉语普通话的 -n 韵尾	(279)
17. 韵律与格律	(292)
18. 文化误解和文化误导举例	(302)
19. 说“三”道“四”	(308)

20. 汉语音韵学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315)
21. 劝君开口唱新声 ——语音教学随笔之一	(325)
22.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 ——语音教学随笔之二	(330)
23. “因为”为什么不能读作 yīn nuèi? ——汉语连音变读研究之一	(334)
24. “文化”为什么不能读作 wén nuè? ——汉语连音变读研究之二	(341)
参考文献	(346)
《音史寻幽》后记	(357)

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研究

引 言

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来考察公元7世纪时汉语的一支影响极大的方言——中原方言的语音系统，对这一音系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且拿它同历来被称为中古汉语语音的代表的切韵音系作一点比较。

进行这一研究，首先遇到一系列必须预先解答的问题：梵汉对音的方法可靠吗？本文所引的材料可信吗？玄奘译音的准确度如何？玄奘本人所操的是何种方音？玄奘译著所体现的音系是否代表玄奘本人的方言的音系？我们认为，方法和材料是可靠的，玄奘译音是准确的，玄奘本人的及其译著所反映的音系是以洛阳音为代表的中原方音。这些都是可以确切证明的。

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所采取的比较方法，需要一个假设的前提，即切韵音系是当时中国整个广大区域的共同语的音系，这一共同语与现代汉语诸方言的关系，就像原始印欧母语同梵语、拉

丁语、希腊语等等的关系一样。^①然而他的这一前提未必是靠得住的。只要看一看我们今天在交通发达、文化普及的程度比唐代不知高出多少倍的情况下，普通话仍然不能完全取代各方言的事实，就可以知道高氏的前提实在是值得怀疑的。而本文所采取的梵汉对音的方法，并不需要事先假设某种前提。梵语的汉字转写，直接表示两种语言（方言）在语音上的对应。只要我们从大量对音材料中找出对应规则来，就不难推求出玄奘所操的方言的音系来。对音的可靠性，在于不直接表音的汉字直接同一种拼音文字相联系，而这种拼音文字由于宗教的保守性千余年来世代相传，未曾废替。作为一种死语言，梵语的语音系统的变化，肯定要比经历同样长的时间的活语言（如汉语、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的变化小得多。佛教的密宗有这样一种信念：颂咒是直接和佛对话，对所念的咒语，可以不必懂得它的意义，但是语音上必须绝对准确，否则非但不能得福，反而可能致祸。汉人学念梵咒，当然首先是要把音念准，因此译音的准确是生死攸关的。正如与玄奘同时的大乘昉所说：“针石一违，有死生之巨痛，有升坠之异途。”^②密教徒对密咒的这种态度使我们对梵汉对音的可靠性具有信心。玄奘虽然说不上是密教徒，但是他翻译过大量的密经，包括很多密咒。除了密咒之外，玄奘对音中还有大量的佛教术语、物名、人名、地名等。有人对这部分对音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③但是实际上这些材料与密咒译音一样具有重大的价值。玄奘创制“五不翻”的学说，主张在五种情况下（一秘密故，二含多义故，三此无故，四顺古故，五生善故），^④必须用音译而不用义译。其中第一、二、五项，宗教

① 高本汉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切韵》辑录的公元 6 世纪的中国北方口语在唐代以后传播到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取代了其他的中古方言，而成为一种语言学家所称的‘共通语’。……在《切韵》声韵里清楚地规定的语言系统是一切现代活方言的直接母语。”《汉语的本质和历史》（*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1949.）

② 见《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序》。

③ 比如钢和泰，见《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国学季刊》一卷一期。

④ 见《翻译名义集》序。

神秘色彩也是很浓厚的。这些译音，甚至一般的人名地名，玄奘也往往改正译得不准的旧译而代之以更准确的译法，所以世称“新译”。宗教的虔诚和翻译的认真给了对音准确性以巨大的保证。

我们对对音的可靠性具有信心，还在于我们所选用的是玄奘译著中的材料。玄奘（公元 600—664 年）是我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翻译家。他从事翻译 19 年，翻译梵文经论 75 部，共 1335 卷。数量之多，恐怕是古往今来第一人。玄奘从青少年时代就“艺殚坟素”^①，精通内外典籍，因深感以往“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②从贞观元年^③起，19 年中，遍游五天竺，亲自访问了西域和印度的 110 个国家，“游践之处，毕究方言”。在北印度的迦湿弥罗国，从僧称学习声明等学凡两年，“法师随其所说，领悟无遗，研幽击节，尽其神秘，彼公欢喜，叹赏无极。”^④之后，又到中印度摩竭陀国那烂陀寺（当时全印度佛教最主要的中心）向高僧戒贤法师学习声明等论先后 5 年。^⑤可以说，玄奘对梵语是极为精通的。时人称道说：“至于因明三量、声论八音，莫不究立破之原，穷字转之本。”^⑥“通言华梵，妙达文筌，扬导国风，开悟邪正，莫高于奘。”^⑦这当是实事求是的评价，决非虚浮的谀词。玄奘既已精通汉梵语言，又深谙佛学奥义，所以他译的经以精确而见长，这是世所公认的。他对旧译多有改正，这在译著中比比皆是。并且最为可贵的是，在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还用明确的文字指出了旧译的错误，这种体例开创了后来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先声，^⑧成为精密地讲究梵汉对音的范例。

① 见《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西域记》）于志宁序。

② 见《旧唐书·玄奘传》。

③ 玄奘开始西行之年有几说，此依章巽校本《西域记》酈隶彬序。亦见本文附录《玄奘行年考辨》。

④ 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卷二。

⑤ 见《慈恩传》卷三。

⑥ 见《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序》。

⑦ 见《续高僧传》卷四。

⑧ 《西域记》成书在贞观二十年（646），《玄应音义》成书在永徽末年（655），《慧琳音义》在公元 807 年成书。

玄奘所译的佛经，是梵文原本。这一点是有很强硬的证据的。玄奘论印度文字说：“详其文字，梵天所创，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寓物合成，随事转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广，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语其大较，未异本源，而中印度特为详正，辞调和雅，与天同音，气韵清亮，为人轨则。”^①就是说，中印度的语言是最标准的梵语。其实这种看法也是印度人自己的看法。《阿毗达磨俱舍论》卷十一说：“一切天众皆作圣言，谓彼言词同中印度。”这也就是所谓中印度语言“与天同音”了。玄奘带回长安的 657 部经，就是从中印度带回去的。^②在回国途中过印度河时险些翻船，失落了一些经部，玄奘又写信到摩竭陀国请那里的朋友再给抄一份来。^③玄奘在长安译出的第一部经《菩萨藏经》就是在中印度的吠舍离国吠多补罗城得到的。^④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玄奘译经的底本确是梵本。从玄奘在《西域记》中纠正旧译的情况也足证这一点。比如“钵逻阇钵底”注：旧云波阇钵提，讹也。按梵文作 Prajāpatī，巴利文作 Pajapatī，新译以梵音改巴利音（或巴利型方音）；“跋禄迦国”注：旧谓姑墨，又曰菴墨。按梵文作 Bālukā，土耳其语作 Kum，新译以梵音改土音；“没特伽罗子”注：旧曰目乾连，讹也。按梵文作 Maudgalaputra 或 Maudgalyāyana，巴利文作 Moggallāna，旧译很可能译自某种巴利型方言，而新译以梵音改正之，等等。初期佛教是经过西域地区的中介由北印度传入中土的，因此有一些译名不是标准的梵语音，而是某种印度方言音，甚至有西域地区的语音掺杂在里头。从玄奘改旧译为新译的一些例子中，正可以看出玄奘所据的经本是梵文本。

玄奘是洛阳人，他所说的方言是中原方言。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原方言，是指以洛阳话为代表的通行于广大中原地区的一支大方言。使用这一术语的根据并不缺乏。陆法言《切韵序》谓“吴楚则时伤清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这是把汉语分

① 见《西域记》卷二。

② 见《慈恩传》卷五；《西域记》辩机赞。

③ 见《慈恩传》卷七。

④ 见《慈恩传》卷三。

成了五大方言区：东南方言、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以及虽然没有提及、而自然包含着的中原方言。“西北方言”这一术语，罗常培先生早已使用了，因此我们这里也不妨使用“中原方言”这一术语。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由关内东移，洛阳在六百年内保持着它在全国的特殊地位。隋唐虽以长安为首都，但洛阳一直是陪都。这种地位在语言中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颜之推《家训·音辞篇》说：“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榘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周祖谟解释说：“盖韵书之作，北人多以洛阳音为主，南人则以建康音为主。”又说：“盖自五胡乱华以后，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音为主。”^①归根结底，以洛阳音为代表的中原方音，占据的地位极其重要。晚唐的李涪仍然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②李涪不是洛阳人，做官在长安，却仍持这种观点，可见洛阳音的影响之大了。

据《旧唐书》本传，玄奘是洛州偃师人。于志宁《大唐西域记》序说：“其先颍川人也。”《慈恩传》说得比较详细：“法师讳玄奘，俗姓陈，陈留人也，汉太丘长仲弓之后。曾祖钦，后魏上党太守。祖康，以学优仕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孙因家，又为缙氏人也。”按陈留郡即今开封一带，颍川郡即今许昌一带，这两郡交界处的尉氏县，在南北朝至隋屡有兴废，曾划归颍川郡，亦曾划归陈留郡。^③或许玄奘祖先即尉氏人。缙氏今属偃师县，唐时属洛州。“周南”即指洛阳。^④隋朝河南郡、唐朝洛州，治所都在洛阳。所以说玄奘世代都是中州人，从祖父一辈开始，就是洛阳人了。玄奘出生于公元600年（隋开皇二十年），^⑤十三岁出家于洛阳，住东都净土寺。公元618年（唐武德

① 见周祖谟《问学集》上，中华书局，1966年。

② 见李涪《刊误》。

③ 见《一统志》卷一百八十六。

④ 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

⑤ 玄奘生年说法颇多，此依吕澂、郭朋说。亦见本文附录《玄奘行年考辨》。

元年)游长安,旋即入川,住两年后,又出峡游方,大约在公元623年入长安。二十八岁时踏上西行征途,时当贞观元年。^①则玄奘在长安仅四年时间。到玄奘由印度回国,年已四十六岁了。从玄奘的经历看,他成年之前主要生活在洛阳,之后云游四方,无久居之地,则他所操的方音当为中原方音,这是没有问题的。西方汉学家们以为隋唐既以长安为都,长安方言必为国语而通行全国,士人们必操长安方音,这实在是一种偏见。玄奘出生于“天地之中”的洛州,放着自己家乡“禀气特正”的方言不说,而去说一种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长安方言,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后汉以下,译经之事都是郑重的大事。除了主译者之外,还有“笔受”、“度语”、“证义”、“润文”、“校勘”、“监护”等多人。^②译经的程序,往往是先依梵文的词序“硬译”成汉文,其次是按汉语语序改正文句,再经修辞整理,中间经过多个人的修改增删。^③因此,梵语的音译所反映的并不单单是主译者的方言,它往往也反映了“笔受”、“度语”等人的方言。但是玄奘译著则不同。玄奘译经虽然也设译场,也有上述“笔受”、“润文”等人,但是起主要作用的仍是玄奘,因为他本人兼精梵汉,深研佛学,《续高僧传》说他“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④《西域记》辩机赞也说:“昔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孔门文学,尝不能赞一辞焉。法师之译经亦犹是也。”^⑤出于弟子对师长的敬仰,这些话或许有部分夸张之处,但基本的事实,即玄奘在译经中是整个译场的核心和灵魂,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玄奘译经中的对音材料,是反映了他自己的方音的。本文所用的材料,相当大的一部分出自《大

① 此依章巽校本《西域记》酈隶彬序。亦见本文附录《玄奘行年考辨》。

② 见《宋高僧传》卷三翻译总论。

③ 见《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

④ 见《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

⑤ 见《西域记》辩机赞。《续高僧传》卷四说,玄奘“翻大乘对法论一十五卷,沙门玄颢笔受,微有余隙。”或许就是因为翻译上的意见不合而闹矛盾。

唐西域记》，这是玄奘自己的著作，与翻经无涉。这部分材料反映玄奘本人的方音，则更是无可怀疑的了。

《西域记》中的小字夹注，是研究玄奘音系的重要材料。通过玄奘对旧译的更正，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对对音字的音值的评价、辨析正误之所由。正文所注反切，亦有同等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说《西域记》的“校正译语，云旧作某某讹者……疑为后人所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今所存敦煌残卷唐写本《大唐西域记》，写成的时间距玄奘仅一百多年，^①比慧琳音义还要早，但上面所注音切与校正译语，已与今本无异，足可证明这是原书所有，绝不是后人所加。

本文所用的材料，取自玄奘的全部译著（用金陵刻经处《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本）。这些材料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圆明字轮四十二字的译音；二、密咒的对音；三、梵词的音译。这三种材料的数量、性质都有不同，我们处理的方法也有不同。

圆明字轮四十二字的译音，见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十三卷及四百一十五卷。两处所译完全相同。这四十二字历来有许多人译过，各有同异，反映了各个译者的时代和方言的特点。字数虽少，但对于对音极为重要。

玄奘所译密经不少，但只有少数尚能找到梵本。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保存了用悉昙字书写的《能灭众罪千转陀罗尼咒》、《不空罽索神咒心经》和《持世陀罗尼经》。^②另外，《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天城体梵本还在。这些经咒都不止一个汉译本。从各本的异同看来，各自所据的梵本恐怕也未必是同一个本子。因此，虽然译者译经时极其认真，但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梵本对勘，不免仍有错舛衍漏之处。因此，我们在处理时，主要是寻求规律性的语音对应，如果事出规律之外，又无旁证，我们宁可认为它是例外（或错字），而不强为对音，曲为诠解。相反，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对明显错写的梵字或汉字进

① 见《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引言。

②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No1034；No1094；No1162。

行改正。如《不空绢索神咒心经》有一段，梵本作：

𑖀𑖩𑖩𑖩 𑖀𑖩𑖩𑖩 𑖀𑖩𑖩𑖩

玄奘译作“窄鲁窄鲁，主鲁主鲁，母鲁母鲁”（原文次序有颠倒，已改正）。倒数第三字为𑖩 (ra)，译为“鲁”。按照整个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梵本是抄错了，把𑖩 (ru) 抄成了𑖩，少写了一点。又如《持世陀罗尼经》有一句梵本作𑖀𑖩𑖩 (vaṣaṃṇi)，汉译作“罚栗杀尼”，相差较远。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是𑖀𑖩𑖩 (varṣaṇi) 的误写。而另一种情况，如梵本作 niṣpanani，汉译作“昵𑖩波达尼”，^① 以“达”对 na，这种以塞音对鼻音的现象在玄奘译著中只是特例，并非有规律的对应。所以我们宁肯认为有一种本子写错了字，而不贸然断定玄奘方音中有塞音变鼻音的趋势。

以上两部分材料，对音是相当精密的。这两种材料中出现对音字 188 字，占全部对音字 619 个的 30%，为数亦颇可观。这些字对音情况比较单纯，少量错字容易鉴别，这是我们研究的基本材料。

梵词的音译在我们的材料中占了极大的比重，是我们对音的重要材料。这些音译词的梵语书写形式来源不一，主要取自：一、《大正新修大藏经》^② 卷五十四《翻译名义集》所附的梵文；二、丁福保《佛学大辞典》；^③ 三、日本崛谦德《解说西域记》、^④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の研究》，^⑤ 英国 Thomas Watters 的《大唐西域记》英译本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 A.D.*；^⑥ 四、梵英辞典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Monier Williams. Oxford. 1899)。^⑦

对这些材料的处理，我们应该非常慎重。首先，梵文形式是否正

① 见《持世陀罗尼经》。

② 以下简称《大正藏》。

③ 以下简称《典》。

④ 以下简称“崛本”。

⑤ 以下简称“足立本”。

⑥ 以下简称“T.W.本”。

⑦ 以下简称“D.”

确,对于对音关系极大。比如《西域记》卷九“迦兰陀竹园”(76-9-12),^① 崛本作 *karaṇḍa*; 以竹园得名的羯兰铎迦长者(66-183-6),《典》作 *karaṇḍaka*, 汉语的定纽字“陀、铎”译梵语的 *ḍ*, 对不对呢? 按竹园及长者都从好音鸟得名, *D. karaṇḍa* 义为“篮子”, *kalandaka* 才是鸟名。定纽字对 *d*, 方合对音通例。因此我们对不同来源的材料全部用 *D.* 核对一遍, 凡是 *D.* 不收, 音属可疑者, 对音时都要特加小心。

汉字的写法也存在校勘的问题。玄奘时代还没有大规模的印刷业, 手抄相传, 错讹难免。《慧琳音义》就指出过这类问题。1-53-17“入橛字门”,《音义》说:“‘橛’传写错谬不成字, 梵音正当‘侏’字”(按全集本字作‘橛’, 不误。可能慧琳所见本子抄误, 也可能今本是据慧琳所言而改); 1-127-8“达絮”, 或又作“达絮”,《音义》卷四说:“达絮……经文有作达絮……书写人误也。”^② 又 1-325-17“扇橛”,《音义》说,“橛音勅加反, 经作掙, 不成字”。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 如“拘胝”写作“拘胝”(1-1-2),“祇釐”写作“祇釐”(76-11-7),“扇橛”写作“扇掙”(67-上-14),“毗湿缚”写作“毗隰缚”(66-85-13),“西你迦”写作“拈你迦”(66-114-2),“曼陀枳尼”写作“曼陀枳尼”(66-171-9),“頞你罗”写作“额你罗”(8-13),“阿摩洛迦”写作“阿摩洛伽”(76-8-7),“补羯娑”写作“补羯婆”(52-9-9),“盐母那”写作“监母那”(61-10-18),“毗簸奢河”写作“毗簸奢河”(64-7-11)等等。这些都是明显的, 其中一部分同别本一校对就可以发现。凡属这种情况, 我们就径改过来, 对音时就不再特别说明, 有需要说明的则随处交代。

玄奘译音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即有的梵语词旧译不切, 玄奘已有新译, 但旧译形式亦时而出。如 76-2-2“踰缮那”旧曰由旬, 又曰踰闍那, 又曰由延, 皆讹略也, 然而 4-37-15 又出现“由旬”一词。有的旧译虽不切,

① 为简便起见, 引用译名出处标三段式数字, 第一个数字表示经名(1-76 代表玄奘的 76 种译著, 见后附表), 第二个数字表示卷数, 第三个数字表示页码(依金陵全集本)。不分卷者标两段式数字。

② 这一条慧琳的意思是“达絮”为正,“达絮”为误。实际按 *D.*, 达絮(*dasyu*)是对的, 慧琳弄颠倒了。但是他敢于指出经文有抄错的情况, 是足供我们参考的。

却因而不改，如“佛”、“梵”、“沙门”、“涅槃”等等。有的旧译不切，新译改而未彻底，仍然有些不太妥当，如“钵”改为“钵多罗”等等。佛教入华，到玄奘时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一些旧译名沿用成习，有一些甚至是不便更改的。因此，旧译名在玄奘译著中亦时而出。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少数。我们在处理这些材料时，凡玄奘已经明确指出旧译“讹也”的，则从新不从旧，凡情况比较复杂的，另外予以说明。

上文提到的正文中的小字夹注，在对音中是极其重要的资料。这些夹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注音，给出反切或标出声调。如 76-5-18 “鞞索_{山格反}迦”，76-1-11 “屈_{居勿反}霜_{去声}你迦”，等等。第二种，译义，如 76-2-5 “尼罗蔽荼_{唐言青藏}”，76-9-23 “迦布德迦_{唐言鸽}”，等等。第三种，纠正旧译，如 76-3-8 “末田底迦_{旧曰末田地，讹略也}”，等等。依靠这些夹注，对音中的许多困难可以得到解决。

夹注给出的反切和声调有多种作用。第一，它指出多音字在这里应该怎么读，如“屈”字，《广韵》“九勿、区勿”两切，76-4-6 “屈_{居勿反}露多国”，梵音 *kulūta*，见纽正对梵音 *k*。第二，给出韵书所没有的特殊读音，如 76-1-11、76-1-12 两处注“霜_{去声}”，按韵书“霜”字没有去声一读，相当于“霜”去声的音韵位置也没有别的字。76-4-16 “瞿毗霜那”，梵音 *govīṣāṇa*，可知对长元音须是去声。第三，使我们有可能识别错字。如 76-2-4 “顚_{捷严反}钵罗衣”，“顚”一本作“頔”，按反切顚字应读溪纽，而韵书頔字无溪纽读音，《慧琳音义》字作“頔”，也是溪纽字，证明頔乃误字。第四，反证梵语形式的正误。76-3-3 “摩愉_{唐言豆}”，足立本以为是梵语 *mayūkha*（光明）的略称。很明显，足立氏以为“愉”音 *yu*（《广韵》羊朱切），故作此对音，但译义不合。T. W. 本作 *masura*，译义为“豆类”，但是“愉”作 *su* 音，韵书也没有依据。76-1-13 “愉_{朔俱反}”，根据这一反切，我们找到“摩愉”一词的梵语原形 *māṣa*，正译为“豆”。*māṣa* 的音变形式 *māṣo* 正好对译为“摩愉_{朔俱反}”。^①

① 梵语 *sandhi* 规则，*a* 结尾的阳性名词体声尾 *-as*，在下一词开头一个音是浊辅音或元音（*a* 除外）时，*as* > *o*。但是“愉”音“朔俱反”也很可疑。《广韵·虞韵》有“輸，山芻切”，音韵地位与“朔俱反”相同。然则“愉”可能是“輸”，形近而误。

又如, 76-5-2 “曷逻阇伐弹那^{唐言王增}”, 崛本梵语作 *rājya-vardhana*, T. W. 本作 *rājavardhana*。根据意义, 前者当译作“国增”, 后者乃译为“王增”。这样我们就找到正确的梵语形式来进行对音。

纠正旧译的夹注在《西域记》中多至八十余处, 从新旧译的对比中, 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译法在声、韵、调上的细微差别, 剖析旧译、新译各自所代表的音系的差别, 探寻语音发展的趋向。有了这些夹注, 我们就可以了解玄奘译著中最大量的音译梵词在对音中的实际价值, 不致被羼杂其中的少量旧译所淆乱。比如梵语 *gaṅgā*, 76-1-3 “^{巨开反}殑伽河^{旧曰恒河, 又曰恒伽, 讹也}”, 这是告诉我们, 旧时以匣纽字对梵语 *g* 音, 到唐代已经不适宜了, 因此, *gaṅgā* 译作“恒僑”(68-11-10, 69-31-14), 亦是旧译的遗留, 不应当看作梵语 *g* 在唐代仍与汉语匣纽对应的证据。下面我们常常要用到这些夹注来解决对音中的问题。

梵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因此梵汉对音不像印欧语言之间“转写”那样简单。为了适应具有不同结构特点的语言间的音译, 玄奘也像历代译经师一样遵循一定的对音规则。尽管没有给我们留下成文的条例, 但是我们通过归纳大量译例, 还是能够发现这些规则的。下列四条是其中最主要的:

1. 汉译多用词干或体声。梵语的名词, 字典上给出的是词干形式, 实际使用中有八啞声的变化。汉译多用词干或体声的形式, 如:

词干	Arhat	体声	Arhan	汉译	阿罗汉
	Śikhin		Śikhī		尸弃、式弃
	kalala		kalālam		羯罗蓝
	gaja		gajas		揭闍

等等。在梵咒中也有用其他声的, 但在玄奘译著中所占数量不多。

2. 改变梵语分音节规则以适合汉语音节结构。梵语除了句尾之外没有闭音节。如 *muñcalmuñca* (17-12), *mu* 为一音节, *ñca* 为一音节。玄奘方音中看来并没有 *ñca* 这样的音节, 所以就改变音节划分, 译为“闷遮闷遮”: *muñcalmuñca*, 诸如此类。

3. 一个字母前后两音节兼用。如 *ghana* (体声 *ghanam*), 译作“键